

三代考古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三代考古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近年来关于三代考古研究的论文集,分别从考古学理论概念及综合研究,三代文化、都邑、墓葬和器物研究以及甲骨文、金文研究等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论证,并对学术热点“夏商文化界标”展开专门讨论。

本书适用于文物考古和文化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代考古(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三代考古丛书)

ISBN 7-03-014010-9

I. 三… II. 社… III. 文物-考古-中国-三代时期-文集 IV. K87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888 号

责任编辑:闫向东 霍杰娜 / 责任校对:宋玲玲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陈 环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源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6

印数:1—1 400 字数:605 000

定价:9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环伟〉)

序

《三代考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辑的关于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论文集。夏商周考古学上承史前考古学,下启汉唐历史考古学,无论从学科内容,还是学科理论、方法来说,夏商周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学术地位都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作为专门从事夏商周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科研单位,承担了夏商周考古学多项重要科研任务,如山西陶寺遗址、夏代都城二里头遗址、早商都城偃师商城遗址、晚商都城安阳殷墟遗址、西周都城陕西周原遗址、丰镐遗址等田野考古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和《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等重大科研课题。本论文集反映了上述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一些新的科研成果,同时它也是这个科研集体近几年科研成果的一个汇聚。

《三代考古》的科研成果,是建立在夏商周考古研究室近年来重要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础之上的。这些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殷墟遗址、周原遗址等。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我所进行多年工作的龙山时代的重要遗址,以发现大型墓葬、出土彩绘“龙盘”和其他重要文物而闻名。近几年来我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以探索城址布局、研究明城址文化内涵、推进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为主旨,在陶寺遗址进行考古研究工作收到令人鼓舞的成果。陶寺文化城址的发现与确认,填补了山西乃至西北地区龙山时代城址的空白;使我们对于城址文化内涵和布局结构有了崭新的认识;城址南部新发现的近圆形大型夯土基址,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最具中国古代礼制建筑特色的遗址,它为研究中国古代礼制建筑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在新发掘的陶寺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一些新的遗迹现象,并有不少重要遗物出土。陶寺遗址作为一座同时具有城墙、大型礼制性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墓区和高规格墓葬的城址,是目前所发现的几十座龙山时代城址中绝无仅有的,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研究中,有着的其他龙山时代城址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意义。

二里头遗址是夏代都城遗址。近年来,运用古代都城遗址考古的方法,

以寻找古代城址道路遗迹为切入点,探明了城址中心区的路网结构,进一步探索、确认了宫城城墙的分布。这是目前中国古代都城中发现的最早的宫城遗址。对宫城遗址中多座大型夯土建筑遗址进行的发掘工作,为进行二里头文化不同时期宫城布局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考古资料;为探讨宫城之内不同大型夯土建筑遗址的功能,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对偃师商城宫城遗址的进行大规模发掘,是一项跨世纪的考古工作。新世纪伊始,宫城北部发掘的池苑遗址,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发现的最早的宫城池苑遗址;宫城内祭祀遗存的清理,丰富了人们对当时王室祭祀活动的认识。对宫城遗址之中的宫庙建筑、祭祀沟和祭祀坑、池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使早商王国的文明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安阳洹北商城城墙的确认,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为探讨洹北商城的年代、性质等重大考古学问题,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安阳殷墟 54 号大墓的发掘,是继妇好墓之后,在殷墟宫殿区发掘的第二座未被盗掘的高级贵族墓葬,出土文物相当丰富;小屯南地商代甲骨的再次出土,进一步丰富了殷墟甲骨资料;我所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的孝民屯商代聚落遗址、环壕式祭祀遗址、数以千计的小型墓葬和内涵丰富的铸铜作坊遗址等,极大地推动了殷墟考古的发展。

周原遗址在沉寂多年之后,我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对云塘大型夯土建筑遗址、铸铜作坊遗址等进行了考古发掘,推进了一些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研究的进展。

以田野考古工作为基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的同志们还整理、编写了一些重要考古发掘报告和论著。近年出版的《花园庄甲骨坑》、《偃师商城初探》等,在学术界都有较大影响。

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的同志们所取得的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将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留下其学术光辉。但是,中国考古学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夏商周考古学也不例外,需要我们考古工作者去探索的未知领域还有很多;过去已经获得的认识,也有进一步完善、充实、甚至修正的必要;大量新的田野考古资料的出现,挑战着传统的学术认识;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夏商周考古学中得以广泛地应用,夏商周考古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更加深入地结合,更是夏商周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尽管夏商周考古学的发展任重道远,但因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同志们具有兢兢业业、敢于拼搏、勇于奉献、肯于钻研的精神,我相信一定会在这一学术

领域做出骄人的成绩。在《三代考古》付梓之际,我再次对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同志们所取得的科研成就表示祝贺,对于他们和全所同志为促进我所发展,为尽快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设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研究所,为中国考古学的崛起所做出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刘庆柱

2004年7月28日

目 录

考古学·证史倾向·民族主义

——《剑桥中国史·商代考古》提出的问题·····	唐际根 (1)
青铜时代与青铜文明概念管锥·····	何 弩 (9)
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延滞现象和“边缘化效应”·····	唐际根 荆志淳 (12)
近年来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主要进展·····	王 巍 (16)
礼制遗存与礼乐文化的起源·····	许 宏 (21)
早期城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许 宏 (34)
夏商周三代城市聚落研究·····	徐良高 (38)

略论二里头时代·····	许 宏 (58)
--------------	----------

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

——夏文化再探讨随笔·····	杜金鹏 (66)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及相关遗存再认识·····	岳洪彬 (73)
郑州南关外中层文化遗存再认识·····	杜金鹏 (93)
“偃师商城界标说”解析·····	杜金鹏 (107)
偃师商城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杜金鹏 (124)
河南偃师商城第Ⅱ号建筑群遗址研究·····	王学荣 (126)
试论早商城址的性质及相互关系·····	何毓灵 胡洪琼 (150)
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与殷墟青铜器分期的关系问题·····	谷 飞 (157)
论安阳殷墟墓葬青铜兵器的组合·····	刘一曼 (160)
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	唐际根 汪 涛 (178)
殷墟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研究·····	岳洪彬 (194)
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	王 巍 徐良高 (209)
论先周文化的渊源·····	牛世山 (235)
周文化演进模式的考古学考察·····	徐良高 (245)
西周墓地制度之管窥·····	印 群 (261)
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	徐良高 王 巍 (265)
曲阜鲁国故城之再研究·····	许 宏 (276)
安阳殷墟宫庙区简论·····	唐际根 (291)

殷墟青铜容器分期研究	岳洪彬 (298)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	何 弩 (350)
论殷墟甲骨的埋藏状况及相关问题	刘一曼 (354)
略论甲骨文与殷墟文物中的龙	刘一曼 (371)
关于商周“小子”的几点看法	严志斌 (383)
复合氏名层级说之思考	严志斌 (391)
附录: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科研成果一览表	(397)
后记	(408)

考古学·证史倾向·民族主义

——《剑桥中国史·商代考古》提出的问题

唐际根

曾与一位朋友调侃。这位朋友说，考古界就像金庸笔下的“武林”，对自己的武功抱有信心者，有时会做起“武林盟主”的梦。实现“武林盟主”梦想的手段不外乎两种。一是找几个钱召开武林大会，广发“英雄贴”，当然要附带说明等闲之辈是不在被邀之列的，我邀请你是因为认你是某一门派的“掌门”，至少也是个“香主”。二是写文章“纵论天下”，口吻必须“傲视江湖”，开篇指出别人“招式”漏洞百出，结语是考古学该如何如何。

读过美国著名学者贝格雷（Robert·Bagley）教授的《剑桥中国史·商代考古》（以下简称《商代考古》），想到要写篇评论。但千万不要以为笔者也在做“武林至尊”的梦。我从来没有“天下第一剑客”即将横空出世的感觉。这篇评论中的不少内容是与《商代考古》原作者讨论过的。与贝教授“网络论剑”的过程中，深感其剑法精妙，真的比试起来，我根本不是对手。只是拆招过后，也窥出贝门剑法的几个破绽。现照江湖办法“点到为止”。如果这样的招式拆解有助于提高“武林”的整体水平，我想是我和贝格雷教授的共同愿望。

一、中国考古学中的“民族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伊·霍德（Ian Hodder）和克利斯朵夫·梯利（Christopher Tilley）等为代表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家对过程主义考古学（新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尽管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考古学，大多数新考古学家和文化历史学派考古学家继续走着自己的道路（这是由后过程主义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但后过程主义的批判揭示了许多现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考古学并不像新考古学所想像的那样是一门获取纯粹客观知识的学问。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考古学被用来服务于民族主义目的或政治目的。因此后过程主义者主张，考古学不仅要研究古代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同时还要反省考古学的知识体系本身。

中国的考古学诞生于 20 世纪初。无论从西阴村发掘还是从殷墟发掘算起，至少有 70 余年的历史。过去的 70 余年中，中国的考古研究是像世界许多地方一样充斥着研究者的主观意愿（包括民族主义目的），还是符合科学的客观规范呢？

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将这一问题严肃提出的是西方学者。仅笔者所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西文刊物中涉及中国考古学中“民族主义”（Nationalism）问题的文章便有 5 篇。贝格雷教授在《商代考古》中的许多部分都谈到这一问题。作者以批评的口吻写道，“对于后继者来说，光证明传统文献可信仍然不够，民族考古的另一个任务是要将中国文明产生于外部刺激的结论中解救出来；马克思主义从 1949 年以后进入中国，但其影响通常只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能够感受到，在后期考古学中，马克思主义者寻求普遍历史规律的要求被追溯地区历史的（民族）愿望压倒，因为后者可能成为获得民族荣耀感的源泉。考古学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满足强烈的民族主义需要。由于这一因素，当时（中国考古初期）没有什么比找出安阳文明的本土源头更受到重视”。“通过显示其证史能力，安阳发掘为考古学这样一个国共两党政府均不重视的学科（两党均将外国学者排斥在田野工作之外）在中国赢得了立足点，但其的代价是它成了证史的工具。”“民族自豪感使得解释考古资料这一本来就十分棘手的问题更为复杂。由于坚信传统可靠，考古学的任务变成仅仅是证明文献。研究工作仅仅是为了搜集与文字记录相一致的证据，与之相矛盾的证据被忽视或曲解了。考古学陷于悲哀，它失去了为公元前二千纪（的中国社会）独立提供视角的机会”。在贝格雷教授等西方学者眼中，中国考古学的“民族主义”倾向不仅十分严重，而且毫无疑义地带有普遍性。

如果冷静地看待 70 余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历史。贝格雷教授等西方学者说中国考古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确没有冤枉中国学者。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学术被“历史为现实服务”，“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样的政治口号引导。因此 1950 年殷墟武官村大墓的发掘，被迅速用作证明商代是奴隶社会的证据。甚至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还在用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坑资料揭露和批判“万恶的奴隶制度”。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在中国考古学中的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对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讨伐。有这样的例子，我们无需再多说什么。

但贝格雷对中国考古学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指责仍然是需要质疑的。问题出在他将部分学者的行为夸大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似乎中国考古学家过去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民族主义的需要服务，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实际的情形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只有极少数的考古学家尝试过运用考古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解释（如张忠培先生的《元君庙仰韶墓地》），绝大多数的中国考古学家都在埋头于发掘、整理田野资料。那时中国的考古工作主要由夏鼐先生主持和安排，夏鼐先生严格要求中国的考古学者只发表材料，而不允许随意性解释。翻开当时的《考古》或《考古学报》，发掘简报或报告占了绝大多数。许多简报或报告的作者在报告的结语中写上了自己对材料的解释，但发表时大都被删除。我相信夏鼐

先生是有意识这样做的。1980年以后，随着中国考古资料的时空框架逐步起立起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参预对资料的解释。这时整个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学者对考古材料的解释中，我们看不出有多少民族主义迹象。他们的解释尽管未必都是正确的，但都建立在考古记录的基础上。

贝格雷教授批评中国考古学为“民族主义”服务的主要证据，是中国考古学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精英阶层，发掘工作常常围绕都城或大型遗址展开，对小型遗址、普通聚落重视不足，解释上则表现为强调大一统，强调黄河文明高于周边文明。

如果常年发掘安阳殷墟、郑州商城，或者讨论二里头文化是否是夏文化都是民族主义特征的体现的话，那么中国考古学的确是完完全全的民族主义考古学了。但我看不出这些工作与民族主义有什么必然联系。

要了解一个古代复杂社会，最好是先获得一个关于该社会的总体轮廓，然后才可能求证其细节。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大型遗址（包括都城在内）资料丰富，它所包含的古代社会特别是复杂社会的信息量，是一般的小型遗址所不具备的。将研究重点放在大遗址和都城，是资料上和方法论上的要求。西方学术界同样相对更重视大型遗址的研究。两河流域的乌尔（Ur）遗址，印度的哈拉帕（Harhapa）遗址都曾常年发掘。当然，小型遗址确实是要予以重视的，正因为如此，中国考古学界才组织一次又一次的文物普查，以掌握和了解各种大大小小的古代遗址的分布情况。尤其是近年的研究中，随着聚落考古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从区域的角度研究古代社会。这种转变，是需要以大遗址研究取得初步成果为前提的。

至于对中国考古资料的解释出现了黄河文明至上论，我不敢说它与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完全没有联系。但如果认为黄河文明是中国古代最发达的文明就是民族主义，那么我可以举出中国学者的“反民族主义”（denationalism）的例子。这就是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在中国学术界，同意“满天星斗”说的学者大有人在。认为黄河文明相对发达的学者，主要是由于他们从逻辑上相信文明发展进程的不平衡性，认为在诸多文明中，一定有一种相对优越，而不是出于以“黄河文明”排斥其他区域文明的“爱国主义情操”。

实际上，即使从“民族主义”者的功利要求出发，他们也未必需要否定中国范围内多种文明并存。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中原外围的秦和楚在中国学者眼中与燕、赵、齐、韩一样受到重视。

在我自己看来，目前的确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古代黄河文明相对发达的观点。商代的卜辞记录中大量提到周边的方国、部族。仅从卜辞看，这些方国部族都不如商强大。卜辞本身可能带有偏见，但西周铜器铭文中涉及到商的，也都将商视为真正的大国。正因为如此，“天亡簋”才要将“武王克商”作为重大事件记下来，而西周兼并其他小国时，却未必留下这样的记载。西方学术界的墓葬学说（Mortuary Archaeology）多认为墓葬资料（如 Energy Expenditure）可以判定社会组织。面对安阳

殷墟王陵区的规模巨大的四条墓道大墓，我相信依西方学者的标准，商代同样会被判定为 3000 余年前中国境内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

说商文明是北方甚至 3000 年前中国最发达的文明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其他地区如长江流域发达文明的存在。自三星堆祭祀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发现以来，没有人否认长江流域的三星堆文化和吴城文化有着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但如果因为这两支文化青铜冶铸水平很高就说他们在文化的总体水平上高于商文化，岂不也是过于轻率吗？

热爱自己的民族，关注本民族的问题并没有错。关键在于研究过程要用事实说话。以批评的眼光盯着中国考古学中的民族主义，则越看越相信中国学者大都是民族主义者。但如果反过来观照自己，是否也有“西方至上”的嫌疑呢？尽管西方学术是当前的主流学术，但一定要将西方观念视为全世界应遵循的标准，是否可以理解成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

二、历史文献的功与过

贝格雷教授批评道：“（对中国考古学家来说）传统文献提供了充分而准确的史料，所有的考古发现都应当在这类史料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他写道：“商代考古是在传统史学已经提供了有关过去的充足证据，所有地下发现都可以在已有的历史知识中找出相应位置这样一个前提下展开。”“田野工作受到历史文献束缚，因而重点是所谓的‘中原地区’，即黄河中游地区以及渭水流域，因为传统文献所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在这一带。”“新的发现只是附加到传统史学提供的框架之下：由于商王朝在晚期文献中是作为当时政治文化最为发达的王朝记录的，因而不属于商王朝的考古发现要么被当作商的政治附庸，要么当成边陲的野蛮部族。”“考古工作被文献中的人物和地名预先框住，野外调查地点的选择，发掘遗址的确定，甚至出土材料的解释均受其影响。考古材料所具有的‘写’出一个不同于文献的人类历史的可能性没有受到重视。”

在对贝格雷教授的意见进行评价之前，我认为必须分清两个不同的概念，即史学取向（historical orientation）和证史偏向（the trend of vindicating textual records）。前者指考古学的目标，而后者指的是单纯用地下发掘出的实物验证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我同意中国考古学具有明显的史学取向，甚至可以直接称为“史学取向的考古学”。但我看不出“史学取向的考古学”与“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之间有什么根本性的冲突。

中国考古学过去将较多的精力放在时间维度（历史的或纵向的）上，并不意味着忽略或放弃人类行为的研究。在我看来（我想大多数中国学者会同意我的观点），只有正确地将考古资料放到一个合理的时空框架中，才可能走向下一步，即复原人类生活。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考古学的时空框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中国学者有关古代社

会生活或人类行为方式的研究做得很少，但这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而更多的是出于步骤上的考虑。例如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即在安阳洹河流域进行了区域调查，但当时连龙山文化与早商文化之间的文化面貌还不清楚，中商也没有辨认出来。遗址虽然发现不少，但由于陶器编年尚不准确，一些中商遗址被当成早商遗址处理，而年代介入龙山文化与早商文化之间的下七垣文化遗址被归入了龙山文化晚期。在那种情况下，任何横向的复原聚落布局研究或景观研究（Landscape Archaeology）都是危险的。

中国是一个保存古代文献比较丰富的国家。其先秦著作如《国语》、《左传》、《竹书纪年》、《诗经》、《尚书》等，记录了中国早期社会的许多信息。尽管这些记录未必全部真实，其中有的可能夹杂有记录者的个人偏见或种族偏见。但经过中国历代文献学家的不断考订，证明大多数记载是可靠的或基本可靠的。因此对这些文献视而不见可能是更大的错误。顾颉刚和他的疑古派对史学的贡献在于告诫人们引用史籍时要慎重，但并不否认文献的价值。顾吉刚本人就曾力排众议，考订《逸周书·世俘》是一篇可信的文献。

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贝格雷教授并不否定历史文献，而是由于怀疑文献的偏见或隐含有错误，因而主张应该将文献放在一旁，先由考古学独立地建构一个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框架。对于这样的提议，我是完全同意的。实际上，中国的多数学者（可惜不是全部）过去也都是这么做的。

但贝格雷教授的下一步走得未免有些远了。他反对任何在没有文字作为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将考古遗存与特定历史群体相联系的努力。他认为，中国目前所发现的遗址中，仅有安阳殷墟由于发现甲骨卜辞因而可以确凿无疑地看成前 13 ~ 前 12 世纪的商王朝的一部分，而安阳殷墟以外的其他遗址都未必是“商遗址”。“二里岗”遗址因为没有发现可以称“商”的文字证据，不排除它曾经是武丁某一先祖时期的敌对国的可能。所以他在多数场合都不称“二里岗文化”为早商文化，而称为“二里岗文明”甚至“二里岗帝国”。

贝格雷教授的苛刻主张实际上割断了考古与历史文献的所有联系。因为甲骨文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考古资料，这样就没有了文献的任何地位。这样做虽然看起来严谨，但却有可能将考古学陷于找不到正解或对考古资料解释不完全的境地。如同历史文献有局限性一样，考古资料因为受保存程度、发掘面积、发掘水平等条件限制，同样是有局限性的。地下资料本身有时不能提供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的解释，而有时会同时出现若干符合逻辑的解释。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果有文献记录相参照，对考古资料的解释是有益的（当然必须保证考古资料得到独立分析）。甲骨卜辞常常提到商王朝周围的众多方国和部族。如果我们在安阳以外发现一个遗址，其年代属晚商时期，物质文化与殷墟有密切联系，地理位置正好与卜辞中提到的某一方国相应，我们为什么不能推测该遗址可能即卜辞中某方国的遗存呢？例如发现于河南罗山县蟒张

乡天湖村的晚商时期的墓地，文化面貌与殷墟类似，墓葬出土的铜器上普遍出现“息”字铭文，而“息”正好是卜辞中提到过的一个方国，因此李伯谦先生考证天湖墓地为商代息国墓地。我们应该有信心相信这样的考证。

文献记录与考古资料的联系，决不止甲骨卜辞与殷墟遗址的关系那样“明明白白写着”这样一种形式。甲骨卜辞不仅记载了盘庚和武丁，也列出了包括商汤（大乙）在内的盘庚以前的诸王以及汤以前的早期“先公”，我们有理由相信殷墟只是商代后期的遗址而决不代表整个商代。而在所有年代稍早于殷墟的诸遗址中，又必有一些是属于早商时期的。

因此以邹衡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二里岗遗址是早商遗址的论断决不是简单的“以文献记载解释考古资料”或“以考古资料证明某些文献记录”。邹衡先生论证二里岗文化为早商文化的思路十分清楚。他先基于纯粹的考古数据讨论郑州商城的年代、地望、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它与殷墟所发现的物质遗存的关系，最后才讨论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因此他的方法是符合“独立地分析考古资料”标准的。只不过他得出二里岗文化已经是国家形态的文化后，将“二里岗”的名字给了早商（关于中国考古学界论证商王朝历史的过程，笔者已写成专文发表见 *The Review of Archaeology*, Fall 2001）。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考古学与包括欧洲大陆在内的“旧世界考古学”有着巨大共性。旧世界考古学从来就十分重视文献，如古典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说，美洲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反倒是个例外。为什么要用美国的例外来评判和统一全球考古学呢？其实即便是美国的考古学，也很重视十七世纪欧洲人对土著印第安人的描写。这不也是在运用文献记录研究考古学吗？

真正应该担忧的倒是中国考古学中存在的“证史偏向”（*Vindicate historical records*）问题，即简单地“以考古资料证明某些文献记录”。在这一点上，贝格雷教授是正确的。中国学者中确实存在一批“证史学家”。尽管这些学者相当一部分来自非考古专业，但其简单而危险的研究方法显然不利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然而，“证史学家”在中国考古学中从来没有成为主流。中国考古学家在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时，更多的时候是用考古资料验证历史文献，包括纠正文献中的错误记载。经典的例子是王国维用甲骨卜辞纠正《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次和邹衡先生对文献所载的商代诸都地望的考订。我想这一方面是不应该忽视的。而以考古资料修正文献记录，其前提必然是面对而不是“忽略或回避（文献与考古证据）的冲突”，并且先要独立分析考古资料。

三、青铜器不能替代陶器和遗址的研究

在《商代考古》中，铜器被当作研究商文明的最核心的材料。文章中虽然也讨论了玉器、车马和文字，但没有作为重点。而陶器和遗址分布（在目前情况下，用“遗

址分布”而不用“聚落形态”可能更恰当些)基本上被忽视了。

尽管贝格雷教授明确解释了为什么铜器在商文明研究中具有核心位置,并且极其出色地驾驭着铜器资料,深入讨论了许多问题。但主要以铜器来讨论商文明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可以看到陶器和遗址分布所包含的商文化信息远比铜器所能提供的丰富和深入。

从陶器研究的结果看,商文化可以分为三大时期,即早商、中商、晚商,而每一个时期又可分为若干个小阶段。其序列如下:

早商:早商一期,早商二期,早商三期

中商:中商一期,中商二期,中商三期

晚商:晚商一期,晚商二期,晚商三期,晚商四期

早商时期是商文化扩张的第一阶段,他们至少建立了7处筑有城垣的城址,包括河南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焦作府城商城、孟庄商城、山西的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以及湖北的盘龙城。这7座商城除府城古城和孟庄古城是近年发现和报道的外,其他5座城都早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已见于报道。

早商一、二期时,商文化所覆盖的地区包括今河南全省、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关中地区东部。至早商三期时,商文化又越过西安一线到达关中西部(如蓝田怀真坊遗址)、往东则进至山东泰沂山脉以西以北(如济南大辛庄遗址)。

中商时期是商文化扩张的第二阶段。北部到达拒马河流域(河北涑水富位遗址)、西北抵山西中部(汾阳杏花村遗址)、西部进至岐山、扶风地区(扶风壹家堡遗址)、南部则越过长江,发展到湘江和赣江的北部局部地区(岳阳铜鼓山),并对赣江下游的同时期文化产生强大影响(瑞昌铜岭遗址)。东南方向,商文化发展到安徽中部(含山大城墩遗址)和江苏北部(沭阳万北遗址)。山东一带的商文化则进入稳定和繁荣阶段(济宁一带的许多遗址)。

中商时期诸遗址中,最重要的是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洹北商城和邢台曹演庄遗址群。这些遗址无论从规模还是内容(如城墙墙槽、夯土建筑、祭祀遗迹)看,都非普通聚落。

中商三期时,商文化的发展进入停滞状态,局部地区开始收缩退却。到晚商一期时,商文化的分布发生根本性变化。商文化已经全面退出山西,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地区,陕西的商文化即退至西安以东。唯有山东方向,商文化保持了一定的进取势头,进一步扩展淄、弥两水附近。至晚商四期时,商文化被西周文化所取代。

从遗址分布和陶器特征观察,不同地区的商文化往往显示出区域性特点。中国学者通常将它们划分为商文化的不同地方类型。这种类型早、中、晚商三个阶段都有,限于篇幅,此处不予列举。重要的一点是,《商代考古》中通过分析铜器分布而发现的商文化的高度统一性,在遗址分布和陶器分析上却表现为相对统一性下的多样性。换言之,从陶器看问题和从遗址分布看问题,与单纯从铜器看问题产生了不同结果。在

这种情况下，怎能相信单纯建立于铜器分布基础之上的解释呢？

在文章中，贝格雷教授试图将商代铜器的分布圈与“二里岗帝国”等同起来。这显然是很危险的。据研究，铜器的分布圈只是一个“礼器文化圈”，与“帝国”是完全不能等同的概念。研究商文明，至少要寻求一个基于遗址分布、陶器、铜器三者或更多资料之上的统一的解释。铜器虽然凝固着古代技术上的精华，但陶器在研究古代文化特别是人类生活方面往往比铜器具有更大的信息量。上面提到的陶器所展示的商代社会的复杂性就是例子。

遗址分布所传递的关于商代社会的信息还包括可能与商代都邑（或重要聚落中心）迁徙有关的内容。例如早商时期，郑州、洛阳是商代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而且大遗址较多，特别是发现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这样的巨型遗址。中商一期时，郑州商城虽已衰败，但该地区的遗址密度仍然远远高出其他地区，并且出现小双桥这样的大遗址。中商二期时，郑州地区的商遗址明显减少，但邢台、安阳一带的遗址密度迅速增加，并在安阳洹河流域出现洹北商城这样的大型遗址以及邢台附近出现高密度遗址群。

很遗憾，遗址分布所透出的种种信息，均没有纳入贝格雷教授的视野。

以上，是对贝格雷教授《商代考古》的坦诚评价。应当承认，这样的批评可能有些过于苛刻。或许我应当更多地强调该书的特色和创见。如作者对铜器形态、分布、铸造工艺的精彩分析，特别是作者毫不迟疑地列出一节专写“过渡阶段”青铜器的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再者说，《商代考古》出版于1999年春，写作时间还要更早一些，而本文运用的考古资料不少是近一、两年内取得的新成果。以“新资料”为武器打击对手，归根到底算不得本事。读贝格雷教授的文章，深深感受到他作为一名纯粹的学者对考古研究客观化的向往。这篇文章敢以今天的面貌出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受了作者的这种学术精神的鼓励。

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与这些朋友的讨论多是在网络上进行的。出于种种原因，在此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相信他们能够感受到我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谢意。

青铜时代与青铜文明概念管锥

何 弩

中国的三代文明是青铜文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随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诸多学者对于中国青铜时代和青铜文化的追溯研究格外重视。然而对青铜时代和青铜文明的概念与标志等的界定略显含混，不利于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本文试图就这两个概念做一些粗浅的理论性概括。

一、青 铜 时 代

郭宝钧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的《绪论》中说：“（青铜时代），即用青铜做生产工具和兵器的阶段。”^[2]如此，便产生出一些问题，是否偶尔使用青铜工具便证明进入了青铜时代呢？铜礼器的使用是属于什么时代呢？显然，郭宝钧先生的定义不够全面。

随着早期金属制品的考古资料逐步丰富了我们的认识，我们认为所谓“青铜时代”是指一个文化或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明显地依赖青铜制品，而不是偶然地使用和制造铜器。青铜时代可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高级阶段就是青铜文明阶段，下一节详论。青铜时代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青铜器基本限于世俗的日常生产生活及军事领域，而没有进入到礼制领域。

多数学者一致同意冶铜术的出现与青铜时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就仰韶文化时期的个别铜制品的孤例，“我们还不能以此作为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的根据”^[3]。龙山时代，尽管红铜、青铜、黄铜制品以及冶铜遗迹的出土比仰韶文化时期增加了许多，然而，除了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以外，河南龙山和山东龙山文化的铜器仍然是零星的、不成组合的，尚不足以证明青铜器在两地龙山文化的社会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至多可看作向青铜时代过渡，而尚未真正进入青铜时代。

那么，进入青铜时代的物质标志究竟是什么呢？从理论上说，青铜器应当在社会生活中较为经常地运用于比较程式化的行为之中。所以，青铜器的出现就应当有比较固定的组合套路，有比较固定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Context）^[4]。本着这一原则，通过考察中国的青铜文化，我们认为，进入青铜时代初级阶段的标志是，就本文化总体而言，青铜器应当以比较固定的工具套（tool-kits）、兵器套和装饰套的定式组合套出现。